

改革开放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新变化 ——基于拉斯维尔“5W”模式的阐释

贾一村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国际学院, 北京 100102)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俄罗斯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发展已走过了60多年艰难曲折的历程。在其整个传播发展过程中,改革开放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对于俄罗斯文学的传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文中将以传播学的“5W”模式作为研究视角,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以及传播效果5个方面,对改革开放前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活动进行研究分析,进而揭示改革开放后俄罗斯文学的传播发展所产生的新变化,为进一步开展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传播;拉斯维尔“5W”模式;新变化

中图分类号: I 106.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04)02-0137-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4.02.008

On New Changes Made in Russian Literature Dissemination in China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Explained by H. Lasswell's "5Ws" Communicative Model

Jia Yicun

(International School, Tutor of Beijing Youth Politics College, Beijing 100201, China)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China has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6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 R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such a development,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a historic event in China, exerted a huge influence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is thesis tries to illustrate, based on H. Lasswell's "5Ws" communicative model, the Russian literature dissemination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from the angles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 (Who), object (to whom), content (say what), means (in which channel), and effect (with what effect), hoping to give a clear explanation of the new changes made in Russian literature dissemination in China after the reform, and offer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further studies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China.

Key words: Russian literature dissemination; H. Lasswell's "5Ws" communicative model; new changes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俄罗斯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发展已走过了60多年历史。从建国初期的狂热推崇,到文革时期的严厉批判,从80年代初的重现辉煌,到苏联解体后“雄风不再”,再到如今的黯

然消沉,其风雨历程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和一代读者产生过刻骨铭心的影响。纵观其发展史,1978年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一个“分水岭”,此后,俄罗斯文学的传播发展呈现出一派全新面貌。本文将尝试

收稿日期: 2013-08-07

基金项目: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2013年度院级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MY201318)

作者简介: 贾一村(1987-),男,助教。研究方向: 译介学、俄罗斯文化。E-mail: spyjyc@qq.com.

用传播学“5W”模式,来对俄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全面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俄罗斯文学传播发展所发生的新变化。

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可视为一种大众传播活动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种大众传播活动,这是由大众传播的定义判断而得出的:“大众传播是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向为数众多的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1]也就是说,大众传播系统中应包含4个主要环节:传播者、传播信息、传播途径、受众群体。对照来看,俄罗斯文学的传播发展完全具备以上4个完整的重要环节,鉴于此,我们便可采用大众传播学的各理论模式来研究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问题。

二、拉斯维尔“5W”模式

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拉斯维尔在《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一文中完整地提出了传播学“5W”模式,并得到了传媒界的广泛认可。所谓“5W”模式,是指传播过程中的5个部分,即:1)谁 who?(传播主体);2)说什么 say what?(传播内容);3)通过什么渠道 in which channel?(传播渠道);4)对谁说 to whom?(传播对象);5)产生什么效果 with what effect?(传播效果)。同时,拉氏还对应提出了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对象分析和效果分析五种研究分析方法,这也为研究者在对一切大众传播活动进行分析研究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下就以“5W”模式的视角来研究分析改革开放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新变化。

三、从“5W”模式看改革开放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新变化

(一) 传播主体的变化

传播主体的变化亦即“Who(谁)”的变化,是指文学传播者的角色确认。

(1) 改革开放前的文学传播者:国家官方机

构。改革开放前,文学事业的传播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无论是“蜜月期”俄罗斯文学蓬勃辉煌的大发展,还是中苏交恶后被当成“苏修反面教材”而进行批斗,亦或是“文革”时期遭到抵制、封禁乃至陷入全面停滞,形成这一幅迥然不同的传播图景的原因,都是国家政权操控的结果。在政府“家长权威”的掌控下,外国文学进入中国需要经过国家文化机构(如国家新闻总署、国家出版总署、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等)的多层审批,再通过由其严格监管的几个发行机构进行传播发行,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2],决定着国民接受什么内容,怎么传播,并能通过各种监管手段,掌控文学传播的效果,而受众群体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因此,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前,国家官方机构是俄罗斯文学的传播者。

(2) 改革开放后的文学传播者:“政府—社会团体—个体”的“三结合”。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对于文学出版发行事业的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政治管制明显放宽,国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运行和审查机制,开始运用经济杠杆、以宏观调控的手段来规范完善图书市场,对国人的思想意识进行引导和约束。在俄罗斯文学的传播方面,除国家官方文化机构(文化部门、出版社、书店等发行机构)之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参与者——非官方机构、民间社会团体和个体,其中也不乏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文化产业者。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的传播行为主体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国家政府的“一言堂”,昔日的“主角”改变了自己的“职能”,通过制定政策,为外国文学进入中国市场“牵线搭桥”,出现了“政府搭台,大家唱戏”的良好局面,构建起“政府—社会团体—个体”三结合的接受传播“共同体”,他们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协调一致,共同盈利。这一改变大大拓宽了文化交流的空间,增加了俄罗斯文学在我国接受与传播的渠道,对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二) 传播对象的变化

所谓传播对象,即是回答“To whom(对谁说)”的问题,其关注的是文学受众群体的变化。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受众群体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人群的社会构成上来看,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过程。

(1) 改革开放前:从“全民争读”到“私下

阅读”。建国初期的中苏“蜜月期”，俄罗斯文学迅速获得了广泛而庞大的受众群体，得到了中国各阶层读者的欢迎，呈现出“全民争读”的盛况。“当时苏联的任何文艺理论的小册子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得到广泛传播”^[3]。“解放后的最初7年，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196种俄苏文学作品”^[4]。而从50年代末中苏交恶到“文革”之前，俄罗斯文学被作为批判对象，以“黄皮书”形式内部发行。该时期的阅读群体主要包括参与出版发行和审核工作的翻译家、学者、编辑等专业人员，还有对其进行参阅、批判的“内部人士”，以及“蜜月期”俄文学作品的旧时持有者等民间受众群体，但其规模 and 影响都已大不如前。而到“文革”时期，在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笼罩下，绝大多数俄罗斯文学作品被列为“禁书”。十多年间无论公开发行还是内部发行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都屈指可数，其受众数量到达建国以来的最低点。由于政府的“禁读令”，民众只能暗地里私下进行传阅，因而在中国也形成了一批规模不大的俄罗斯文学的“地下读者”。而广大俄罗斯文学的爱好者则沦为受害人，在隐忍和寂寥中等待下一个文学春天的到来。

(2) 改革开放后：从再现“全民争读”到“读者渐少”。改革开放后，俄罗斯文学迎来了“解禁”和回归，压抑已久的国人展示出空前的阅读热情。一时间，俄罗斯文学读物炙手可热，受众群体涵盖党内外各领域、各阶层、不同年龄段和教育程度的社会各界人士，再现了当年“全民争读”的盛况。而90年代以后，俄罗斯文学的受众群体开始发生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老一辈俄罗斯文学爱好者、专攻俄罗斯语言文化和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学者群体。老一辈的文学爱好者大多对俄罗斯文学有着割舍不掉的“苏联情结”。在他们心目中，俄罗斯文学占据着无可颠覆的地位，曾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全部，他们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那份执着和眷恋，或多或少带有对过去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缅怀和凭吊的心情。而专攻俄罗斯语言文化、从事俄文学研究的读者群体多是出自对自己的专业或职业的热爱，因而坚定加入到了“挺俄”阵线之中。但与这些俄罗斯文学的“铁杆粉丝”相反的是，广大年青一代读者却似乎对俄罗斯文学“没感觉”，他们中间许多人连俄罗斯最经典的名著都没读过，连赫尔岑、冈察洛夫、谢德林这样的文学巨匠都“没听说

过”，就更谈不上喜爱了。对这些从小读着武侠、侦探、枪战小说，看着动漫、言情剧、科幻大片长大的“90后”、“00后”来说，保尔·柯察金、卓娅与舒拉、古丽娅、安德烈·包尔康斯基等这些伟大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形象已不那么让他们肃然起敬，俄罗斯文学在这个新生代受众群体中已“黯然失色”、“无人喝彩”。随着老一辈俄罗斯文学读者的逐渐隐退，俄罗斯文学“读者渐少”，受众群体开始“萎缩”，这也预示着俄罗斯文学未来在中国“黯淡”的发展前景。

(三) 传播内容的变化

即是要解决“5W”模式中的“Say what（说什么）”问题，这对深入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传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改革开放前：“严肃为主”的苏俄文学。建国初期的中苏“蜜月期”，在政府的推动下，以高尔基、法捷耶夫、巴巴耶夫斯基、爱伦堡、绥拉菲莫维奇、肖洛霍夫、马卡连柯、卡达耶夫、西蒙诺夫等作家为主要代表，带有浓重无产阶级色彩的“严肃文学”（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为主要代表）被大量引入中国，迅速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在国人心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和强烈共鸣。此后虽然由于政治原因，俄罗斯文学曾遭到过政府当局的批判、抵制甚至封禁，不过它仍能通过“黄皮书”、内部发行和私下传阅的形式，以一种非正常的状态在中国进行传播。即便到了“文革”时期，极少数的几种之前已翻译出版过、且得到过权威人士（如马、恩、列、斯、毛、鲁迅等）肯定的一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人间》、《一月九日》、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5]，也能在书店买到。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前在中国传播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以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倡导朴素坚贞的爱情理想、歌颂伟大共产主义事业为主题的“严肃文学”。

(2) 改革开放后：“雅俗共赏”的俄罗斯文学。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封禁”解除，俄罗斯文学之花开始在中国大地绚丽绽放。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依然是呼声最高的主流文学。同时，19世纪俄国名家的经典名著也广泛畅销。此外，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还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惊喜与期待，许多过去不容触碰的题材和主题的

“禁区”被一一突破,给俄文学的传播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一些在苏联曾经受到批判、后来又获平反的作品,被陆续翻译成中文;苏联早期的象征派和现代派诗歌受到了中国读者的重视,“解冻文学”作品时隔多年再次在中国引发关注,另外,80年代苏联当代文学被几乎同步地译介过来,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欢迎。进入90年代,一批曾在“非常时期”被政府“封禁”的“地下文学”开始见诸于市,如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极大丰富了俄罗斯文学的传播图景,为中国读者打开了深入了解俄罗斯的新窗口。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既没把苏联文学当作崇拜的对象,也不把它看作须从意识形态上加以防范的对手”^[6],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推动我国文学向前发展。

然而也正是在90年代,由于苏联解体、西方强势文学的涌入、国人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等原因,俄罗斯文学开始在中国逐渐失去光泽,呈现出“衰退”之势。俄文学的传播发展产生了一项重要变化——文学的“世俗化”倾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造就了各国文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图景,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形成了“自由化”和“多元化”的格局。而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时代环境的变迁也使得国民的思想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国民开始告别过去那种由理想主义制约的、“革命的”、“战斗的”和“火热”的生活方式,而逐渐尝试着享受其他形式的消费快乐。那些简短易读、轻松幽默、娱乐消遣、贴近生活的大众化通俗文学读物(尤其是西方的快餐文学),更能吸引国人的“眼球”,而以庄严深沉、雄伟恢弘、忧郁厚重、情感复杂、思想深刻为特点的俄罗斯“严肃文学”,因其“娱乐性不够”、“太远离现实”、“过于沉重”、“苦大仇深的”、“难以读懂”等,正在逐渐丧失读者,陷入衰退。

从90年代末开始,在 market 需求的刺激下,翻译工作者和版权部门加大了对俄罗斯当代通俗文学的引进,以求遏止“衰退”步伐,因而形成了俄文学发展的新态势——“雅俗共赏”的态势。一方面,由苏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旧作、19世纪、20世纪俄国经典文学著作和当代部分坚持传统的俄罗斯作家的文学新著构成的“严肃文学”仍旧在中国读者中占据一席之地;另一方面,通俗

文学作品所占比例逐渐升高,一批俄罗斯当代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也开始迅速进入中国市场并得到读者的认可。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雅俗共赏,互不冲突,高低搭配,相得益彰,力图更加丰盈地将俄罗斯文学全貌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俄罗斯文学的新人新作展示出了较高的文学价值,并得到了国人的认可。严肃文学的代表如维克多·佩列文的《“百事”一代》和《恰巴耶夫与虚无》,奥克桑娜·罗布斯基的《偶然》,谢尔盖·卢基扬年科的《守夜人》等,堪称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楷模。通俗文学方面,比较著名的有玛丽尼娜的《卡缅斯卡娅》、达里娅·东佐娃的《收获毒浆果》和《巴黎惊魂》、鲍里斯·阿库宁的《土耳其开局》等,均在国内市场上风靡一时^[7]。不过,虽然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我国在对俄罗斯文学的传播引进上做出了诸多努力,但终究无法与强势的西方文化影响力抗衡,改变不了其总体“衰退”的事实。

(四) 传播手段和方式的变化

亦即“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的变化。与改革开放前较为单一的传播方式相比,新时期俄罗斯文学的传播手段和方式更加现代化和多样化。

(1) 改革开放前:以纸质印刷品为主的传播手段。改革开放以前,受政治意识形态和当时社会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由官方意识形态部门直接控制的屈指可数的几家出版社和隶属行政系统的新华书店构成唯一的图书供应渠道,严格的报刊图书文艺演出审查制度决定为公众提供精神产品的品种和内容”^[8],图书、报刊、杂志等纸质印刷品成为文学最主要的传播手段。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广播、电视等传播手段也开始逐渐步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当时的人们似乎更钟爱于最简朴的图书读本。一本本装订简单平实的俄罗斯文学译作在群众中广泛传阅,读者们充分享受着阅读所带来的无限乐趣。

(2) 改革开放后:纸质印刷品和高科技、信息化传播手段并存局面。改革开放后,我国科技水平大幅提升,网络传媒、计算机和信息化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俄罗斯文学的传播手段和渠道日渐多样化。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俄罗斯文学传播仍旧主要依靠纸质印刷品,其中小说、报

刊杂志是文学传播的“主力”。而进入90年代以来,虽然纸质印刷品仍旧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广播、电视、影院、网络等这些现代化的传播方式以其特殊、新颖的形式,更有效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拓宽了文学传播的途径,逐渐成为文学、文化传播的最重要手段。80年代,许多优秀的俄罗斯作品通过广播传遍中国的大街小巷。9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被拍摄成电影或电视剧,与我国公众见面,例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回归》、《守夜人》、《小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命运的嘲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伯利亚理发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的娜塔莎》等。许多由文学作品改编的新影片开始越来越多地以高新科技拍摄手段赢得市场,逐渐向欧美商业“大片”的感觉靠拢,如《第九突击连》、《星星敢死队》、《列宁格勒袭击》、《安静的前哨》、《我们来自未来》、《风暴之门》、《无畏上将高尔察克》、《布列斯特要塞》等等,这使得很多观众更愿意通过电视、电脑、影院等更为直观、快捷、绚丽的呈现方式来欣赏文学作品。此外,以智能手机、掌上电脑、各类平面播放器等高科技电子设备为载体的大量电子文书和网络数码产品等也纷纷涌现。俄罗斯文学正在力图通过新的、更为迅捷、便携、智能化和人性化的传播形式,走上高科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来追赶时代的潮流,逐渐在我国形成了纸质印刷品和高科技、信息化传媒手段并存的局面。

(五) 传播效果的变化

即“With what effect (产生什么效果)”的变化,是对一种文学影响力的衡量。在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以来的漫漫发展历程中,其传播效果和影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1) 改革开放以前:国人的“精神食粮”。俄罗斯文学曾被尊称为“导师”。建国初期,“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呼声高涨,在政府推动下,俄罗斯文学得以进入中国,成为对中国产生极其重要深远影响的外国文学。正是它的广泛传播使得马列主义思想遍洒中华大地,哺育和滋养了国人的心灵,成为艰苦困境中的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同时,它也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对中国老一辈文学家和读者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催生出一代中国人的“苏联情结”。即便是在惊涛骇浪的“文革”时期,

也没能抹杀掉那份埋藏于国人心底的、对俄罗斯文学的深深眷恋。“文革”后许多中国当代作家都曾坦言俄文学对其产生的重大影响。梁晓声称自己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我对俄罗斯文学怀有敬意。一大批俄国诗人和小说家是我崇拜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乎就是当年我这一代中国青年的人生教科书啊!”^[9]王蒙曾说:“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在张洁、蒋子龙、李国文、丛维熙、茹志娟、张贤亮、杜鹏程、王汶直到铁凝、张承志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到苏联文学的影响。……这里,与其说是作者一定受到某部作品的直接启发,不如说是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的身上屡屡开花结果。”^[10]从这些“坦言”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文学在国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正是由于从俄罗斯文学的“精神食粮”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才有了中国文学今天的发展。

(2) 改革开放至今:一匹“瘦死的骆驼”。改革开放的初期,俄罗斯文学的传播一度再现辉煌。国人情绪高涨,迎接俄罗斯文学的回归。“80年代国内诞生了多种专门译介苏俄文学的杂志,如北师大的《苏联文学》、武汉大学的《俄苏文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当代苏联文学》和山东大学的《俄苏文学》等”^[11],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力却在逐渐下滑。1991年的苏联解体,彻底击碎了俄罗斯文学的“神圣光环”,更加速了其走向“衰退”的步伐。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再加上国民的思维意识形态的重要转变,“世俗”的、“享乐”的思想逐渐占据上风,而一贯以“严肃”为特点的俄罗斯文学,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潮流,推出具有竞争力的文学新作,依旧啃着“严肃”、“经典”文学的“老本”,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昔日在国民心中的“不可磨灭”的痕迹也正渐渐褪去。比如原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曾对中国文学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前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曾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12]然而90年代以后,这一文学流派逐渐失去了光泽,丧失其“主流”地位,而中国文学界似乎也“默认”了这种改变,很少有人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了。于

是,俄罗斯文学便如一匹“瘦死的骆驼”,垂垂老矣,茕茕孑立,在种种不甘与无奈中走向没落。

进入21世纪以来,中俄高层曾就推动俄罗斯文学的传播进行过努力。例如2006、2007年两国互办“国家年”期间,在中国举办了很多俄罗斯文化节活动,国内几大出版社(如上海译文、人民文学、译林出版社等)都大力向读者推出俄罗斯文学作品。然而此类活动却并未取得明显效果,多数年轻人仍旧对俄罗斯文学作品“不感冒”。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经典名著过于“呆板”、“沉重”,当代通俗文学新作又“不见起色”、“没有名气”,新时期拍摄的所谓商业“大片”与好莱坞大片相比“尚有差距”,再加上网络上许多蹩脚的翻译者对影视作品不负责任的“胡译”、“乱译”,导致其艺术价值大打折扣,使得广大民众对俄罗斯文学始终“提不起精神”。而说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力,往往还停留在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海燕》等的几部俄苏文学旧作的老生常谈,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新内容,这不得不说是曾经辉煌的俄罗斯文学的巨大悲哀。而如今,面对残酷的现实,这匹“瘦死的骆驼”也只能凭借其原本庞大的躯体,一点一点地消耗自己,平静地等待命运的审判。

四、结束语

回首俄罗斯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发展的百年历程,人们不禁要感叹,感叹它曾经的辉煌与灿烂,感叹它如今的没落与无奈。然而,在我们缅怀和凭吊这位昔日老友的同时,也应该思考: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是否能培养年青一代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兴趣?随着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加深,俄罗斯文学能否借机“重振雄风”?

俄罗斯文学在我国近百年的传播发展历程对我们又有哪些重要的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更需要中俄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和智慧。笔者衷心期待更多的人关注和加入到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来,为21世纪中俄两国文学事业的交流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张隆栋. 大众传播学总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 [2] 王东风. 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 中国翻译,2003,24(5):16-23.
- [3] 童庆炳,许明,顾祖钊. 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 [4] 陈玉刚.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 [5] 谢天振. 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J]. 中国比较文学,2009(2):23-35.
- [6] 陈国恩. 论俄苏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J]. 外国文学研究,2004(2):97-103.
- [7] 张洪波. “重装上阵”的俄罗斯文学“盛宴”[DB/OL]. (2006-08-28)[2013-07-08]. http://www.ce.cn/books/main/zlzz/200608/28/t20060828_8312164.shtml
- [8] 余抗生. 值得凭吊的墓地——透视五十年代“苏联文学热”[J].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19(3):54-58.
- [9] 梁晓声. 致友人[J]. 外国文学评论,1989(4):125-127.
- [10] 王蒙. 苏联文学的光明梦[J]. 读书,1993(7):55-64.
- [11] 陈洁. 一个甲子的沉浮兴衰[DB/OL]. (2009-08-18)[2013-07-18]. <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8-18/1824041.shtml>.
- [12] 周扬. 周扬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编辑:巩红晓)